

残杀，但幸运的是人瘦马乏，不愿恋战”^①。房龙则提到社会发展的作用 “商业有益于宽容。……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平安无事地用一系列火刑来款待它的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或者布吕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蓄意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就会立即撤出，进而是撤出资本，使城市陷入破产。”^②

虽然宗教的排他性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各种宗教仍会长期并存。《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宗教融合（religious syncretism）的 “不同宗教信仰和习俗的汇合。……宗教融合的实例在东方有摩尼教和锡克教。前者是由 3 世纪先知摩尼融合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而成的二元宗教；后者是 15、16 世纪之交印度宗教改革家那纳克融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成分而成的宗教。它们都在当地受到主要宗教的抵制。在 17 世纪，德意志神学家加里斯都为了调和该国境内新教各派别的分歧，发动一场运动，受到正统基督教人士的鄙视，斥之为宗教融合。”^③ 孔汉思则认为 “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基础上，基督宗教间的统一是可能的。但是，各大宗教均有其殊异的基础；它们之间不可能实现统一。”^④ 宗教常常是 “充当着世界和平的巨大阻力与干扰者”^⑤ 的角色。

自然，并非这些问题就没有化解的可能。在笔者看来，针对这种局面，除了尽力消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歧视和不平等、强化公民意识外，还需要对宗教进行引导。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宗教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除了宗教本身实力较弱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并没有对宗教放任自流，而是进行了管理和引导。当今的中国政府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在欧洲，政府长期以来对宗教放任自流，但并没有收到太大成效：一方面部分穆斯林只是执著于宗教身份，对所在国家认同感不强。阿马蒂亚·森就提到，2005 年的伦敦自杀性爆炸事件乃是一些 “出生在英国但极端被异化的年轻人” 做的（第 102 页）。在另一方面，一些基督徒对穆斯林涌入欧洲又很不满。奥斯陆袭击案的制造者布雷维克就主张要把那些不接受欧洲文化的穆斯林赶出欧洲去，甚至不惜对支持多元文化政策的工党的支持者大开杀戒。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反思过去的政策。

综上所述，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有着深厚的人文关切，探讨了宗教等诸多因素与冲突的关系，对于化解世界上因宗教而起或者与宗教相关的冲突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也提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的文化整合或政治整合中如何看待宗教的相关建议，这对于中国也颇有启发之处。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宗教的属性和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结果得出仅靠个人的转换就能实现消除冲突的结论，并完全否认政府引导宗教、宗教组织的必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温情的幻想。不过，有时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以及独特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还是值得阅读的一本书。

（作者王奇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博士研究生）

安多藏区宗教文化研究新饷

——读丹曲博士《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

朱悦梅

安多（Amdo）地区，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个重要藏族文化地区，常与卫藏和川康并列。范围大致相当于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四个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位处甘南夏河的著名寺院拉卜楞，是这个区域中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丹曲博士近期出版的学术新饷

① [美] 迈克尔·沃尔泽 《论宽容》，袁建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 页。

② [美] 房龙 《宽容》，郭兵等译，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4 页。

③ 同 182 页注①，216 页。

④⑤ 孔汉思 《千禧年伦理的召唤》，刘国鹏译，《世界宗教文化》2000 年第 1 期，第 46 页。

《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系统考论了拉卜楞寺的宗教与文化,为近年来作者对拉卜楞寺研究的集成之作,进而言之,也是安多藏学领域中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研究的总结,如黄明信研究员在是书序言中所说的,“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拉卜楞寺在藏传佛教文化上的贡献”。

该书内容涉及了拉卜楞寺的历史、文献以及佛教艺术三个方面,分为上、中、下三编,外加序言,总计42万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拉卜楞寺的文化艺术,为人们解读拉卜楞寺以及拉卜楞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是丹曲研究员多年来在学术上的重大收获,饱含着他对藏文化的理解,也浸透着作者难能可贵的求索精神。该书是作者继《拉卜楞历史档案编目与拉卜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之后的又一部新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政治史与宗教文化史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拉卜楞寺的建寺历史、活佛系统及各族高僧的研究,展现民族地区区域民族发展的历史。

一个寺院的建成,并不是孤立的一种宗教和文化现象,而是与特定的宗教和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是书从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系统与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关系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从政治史与宗教文化史的关系层面厘清了拉卜楞寺建立的社会背景。17世纪始,蒙藏交流进入新阶段,不仅局限在商贸的经济交流,而更多的是文化交流和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思。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驻牧青海湖到拉藏汗在西藏位居藏王主持和管理西藏的政治事务都说明了这一点。自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建立宗教关系后,各蒙古王公贵族纷纷出资建寺,大批蒙古子弟争先落发为僧,拉卜楞寺正是由和硕特蒙古黄河南亲王察汗丹津出资创立的,在拉卜楞寺创立和发展的数百年中,除了藏族高僧外,同样培养了一大批蒙古高僧大德,他们为加强藏蒙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丹曲先生就藏蒙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对今天我们所提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18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系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丹曲博士就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形成的历史背景、传承及其影响作了专章论述,尤其就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在解放前对拉卜楞地区民族教育的贡献、具有与赛赤同等地位的喇嘛噶绕仓对巩固新疆边防的贡献也重点作了阐述,其经验、特点对今天民族地区的建设仍然可将参考。

其次,文献发掘与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学术体系与研究价值。

藏民族自古至今,流传下来大量的文献资料,内容涉猎广泛,记录了藏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包含了藏族人民世代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历史上的藏传佛教寺院既是宗教僧侣修习佛法的场所,又是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正如著名藏族学者阿芒班智达所言:在安多地区“唯独拉卜楞寺拥有显密之教证、训诫、密法、规范仪则外,明学方面拥有声明、诗学修辞、韵律、天文、历法、占卜,以及各种流派的书法艺术等学科,具有高层次的研究水平,而且在工艺学方面也拥有版刻、绘画、木工、裁缝、金石等专项技艺。这些明学世艺,取自于各地寺院的精品和一流的技艺,具有其时代的先进性。”^①而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相关的文献资料留存,这无疑在今天认识藏族文化与学术发展史的宝库,许多门类的文献都还值得去发掘与探索。在这一编中,丹曲先生从文献学史的视角,总结了拉卜楞寺馆藏的藏文文献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并就国内外藏学界对拉卜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也作了回顾与展望。

第三,全面介绍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涉及的各种文化类型,透过文化现象探索文化本源与内涵。

藏学家王辅仁先生曾说“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光辉夺目,即使置身于世界文化之林,藏族文化也是有其突出地位的。不少外国的藏学家,首先是对藏族文化的羡慕与倾倒,才矢志不移地投生于藏学事业的。藏族文化的感染力,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藏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荣。”^②此言毫不为过,近些年来,随着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除了传统的宗教、历史、文学等领域之外,如建筑、美术、音乐等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学术领域。在本书的第三编中,作者对拉卜楞寺的佛教艺术门类也辟专章综合研究,内容涉及拉卜楞寺的经堂建筑、民居建筑、佛殿音乐、民间歌舞、佛塔艺术、宗教雕塑、民间剪纸、藏文书法、藏文印章等,有些内容甚至超出我们的传统认识,不但丰富了人们对拉卜楞寺佛教文化内容的认识,更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努力剖析,既展示了拉卜楞文化艺术是本地人民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继承本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与周边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辉煌成就,又显示了藏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

① (清)阿芒班智达著,玛钦·诺悟更志、道周译《拉卜楞寺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② 王辅仁《〈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序》(丹曲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页。

与佛教文化相伴相生的历史轨迹,从而证实了拉卜楞文化艺术古老而又独特的艺术魅力。

藏学研究是一个大的学科概念,而其中所包含的研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包括藏族政治、历史、宗教、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各个学科,但每个学科之间又有联系。拉卜楞寺佛教历史与文化也不是孤立的,是与藏学各学科领域都有着直接关联的,《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为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研究,乃至安多藏区佛教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构建从理论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一) 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个性。

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和周围的其它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拉卜楞文化就具备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特点,丹曲先生力图以区域文化的学科体系,构建拉卜楞佛教文化体系,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深入解剖其文化内涵,张示其文化华彩,这无疑对地方文化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作用。

(二) 探索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中国历史文化古今相承,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协和万邦,用统一政体兼容多元民族文化并营造“和而不同”的民族宗教关系。从民族学视角看,中国文化有一种精神和一个结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校训)。它昭示我们贫弱时不自卑而知发奋,富强时不称霸而讲兼容。中国文化的结构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各地各民族人民利用多元文化资源开辟多样的发展前景,最终在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实现各尽所能和各得其所。这就是中国的福祉所在,也是中国能为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表层看似呈现了一种单一的东西,而内部却是多元文化的结合,其丰富多彩就是一种多元的表现。

(三) 揭示藏传佛教文化的特质。

佛教自大规模地走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古印度,就对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佛教跨越喜马拉雅山走向雪域高原后,佛教文化已经超出了古印度城邦地域,藏传佛教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高原上古典的社会文化架构和思想范式也都因之而经历着巨变。拉卜楞藏区,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佛教文化的洗礼,拉卜楞寺的规模也日益宏伟壮观,修习体制也越来越趋于完善,这应当就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完善的结果。

(四) 揭示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关系的重要作用。

民族关系的和谐,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条件,藏传佛教文化是特定时期维系民族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正如《藏族史料中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黄河南首旗亲王史略》一文研究,和硕特蒙古部入居青海藏区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同广大的藏族人民一道,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逐渐演化融合成有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拉卜楞寺以寺主嘉木样活佛为代表的重大活佛与历代中央政府保持者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逐步加深和增进,对巩固西北边疆、安定蒙藏社会秩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丹曲博士的《试述藏传佛教高僧喇嘛噶绕仓对巩固新疆边防的贡献》就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同时在文字之间每每流露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建设的爱国民族意识。从而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建立了新的民族友好关系,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也为今天各民族共同开发青海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对稳定历史上西北边疆局势、增进安多地区蒙藏两族的友好往来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 弘扬宗教领袖人物爱国重教的光荣传统。

中华民族在追求、探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祖国统一的历史长河中,总是把爱国和责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把维护祖国统一当作自己的崇高职责。自古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就有英勇不屈、不怕流血牺牲,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丹曲先生以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系列研究,对藏学学科体系中安多地区区域文化的理论构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从《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一书所介绍的拉卜楞寺佛教文化内容及文化资源,可知作为安多藏区的宗教核心,相关的佛教文化内容相当丰富,而作为一部著作,并不能涵盖拉卜楞研究的全部,这将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拉卜楞寺做为安多藏区的宗教中心,其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必定是安多藏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研究,无疑也会推动安多地区藏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深入。安多地区,以其特殊的文化地理特征,成为藏学研究领域中独具特点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其研究视角既多元化,又自成体系。从历史

学角度，可考察安多地区宗教文化的传承关系与历史演变；从宗教学角度，可在宗教流派与义理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从艺术考古学角度，可考察安多地区宗教文化的历史流变；从政治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角度，可考察安多地区宗教文化在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中的作用；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可考察安多地区宗教文化在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对藏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作用。通过这些视角的研究，来探讨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宗教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信仰体系与宗教修道体系的关系等，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从目前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的研究内容看，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之间的文化比较研究还有待加强。如前所述，安多地区，从社会经济生活上讲，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从人文地理学上讲，则是中原汉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地，同时还与甘肃河州地区回族聚居区相毗邻。因此，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对当地人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产生直接影响，其中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广泛，而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在这个地区的碰撞、交流与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夏河地区藏族聚居区的收缩，藏回通婚等现象，无疑都是区域内部不同文化共生的结果，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去探讨，这也是过去学术界较少关注的。

我国藏学研究学者众多，成果丰富，同时具备丰富文献资源、语言资源和科研资源，也较西方学者更具备资源有效配置的先天的条件。上世纪后 20 大量西方藏学成果的翻译介绍和大量藏文文献汉译本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藏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今天，我国藏学成果的涌现依然呈蓬勃之势，在此基础上合理地整合与调配资源，有助于造就大量国内的国际一流藏学专家与成果，提高我国藏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作者朱悦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

——《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读后

朱展炎

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一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2010 年 10 月，20 万字，以下简称《重玄之思》，所引只注明页码）。该书主要从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本文按图索骥，就该书的一些研究特色作一评述。

一、紧扣时代背景，深究学术源流

道教得以产生，是建立在先秦天人观念、鬼神崇拜、礼乐祭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基础之上。先秦之际的中国思想，更为注重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探讨，宇宙论的思想成为此一时期思想家的重点，其中儒家的天道观、老子的道化论和《周易》的太极生成论就是其代表。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宇宙的来源和归属等终极问题。推而下之，则以天道论人事，试图为当时动荡的时局提出自己安邦治国、匡扶人心的各类“良方”。

汉代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变革期，此一时期儒学的谶纬化和独尊化、经学的古今之争以及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儒释道三教思想之间开始交融。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主流，是以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为基础来探讨天人关系。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哲学之主流则又一突变，力主突破汉代经学之藩篱，走向玄学之思，由宇宙论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加上汉末佛教的传入，玄佛合流的思想则加深了对《易》、《老》、《庄》的思辨深度，玄学所探究的“有”、“无”等本体论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的热点。此时的道教思想主流，则专注于建构神仙理论、规范修仙方法、定制斋醮科仪和编撰道经目录，力图将汉末的鬼神道教改造成神仙道教，以适应上层人士的信仰需求和维护统治秩序，剔除民间道教的革命性和粗鄙性。

相对于汉魏晋时期，道教发展到了隋唐之际，其修道方法和思想已然发生了很大转变。《重玄之思》一书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对此作了总结：1. 道教的义理化；2. 道教的内在化；3. 道教的思辨化；4. 道教的上层化；5. 道教的宽容化。道教在隋唐时期的这五个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道教在大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史的流变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